

#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

吴秀明学术论文自选集

吴秀明 著

浙大中文学术丛书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自序

进入甲子之年岁后为自己编选一本“自选集”，在颇多惭愧的同时引发了无限的感慨。这里将选出相对像样或尚有代表性的拙文坦呈于专家和读者们面前，既有“自我盘点”的意思，更有向大家讨教的用意，我真切地希望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

回顾自己走过的磕磕绊绊的学术研究历程，我以为大体经历了“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文献史料研究”三个阶段，或者说是治学的“三部曲”。我是从历史小说评论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初，为当时涌动的历史小说大潮所感奋，我曾追踪性地作过一段时间的当代历史小说批评工作，像《李自成》、《金瓯缺》、《戊戌喋血记》、《风萧萧》、《星星草》、《九月菊》、《庚子风云》、《天国恨》、《少年天子》、《白门柳》、《曾国藩》、《雍正皇帝》等，都留下了一些带有“呐喊”性质的批评文字；稍后，出于理论总结和提升的考虑，我还撰写了不少历史文学形态理论的有关文章。“作品论”+“形态论”，两方面加起来的批评和研究文章，有100篇左右，结集出版的论著有5部（这还不包括5个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选本，以及2007年出版的1部《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的论著）。

大概是在90年代中后期吧，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的治学慢慢由历史小说研究转到了当代文学史研究上来。先是根据讲义编撰出版了一部《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论著，后是组织团队主编了两部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三卷本）、《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2009年修订扩充为《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我将其称为是对自己学术的一种“回归”——我在高校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就自己的本职工作来说，从历史小说研究向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转移”，不妨可看作是对自己学术工作的一种“回归”。于是，

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我便从专业化的角度,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发展、运行轨迹、创作批评、传播接受及其经验教训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和爬梳。当代文学至今虽只有近70年历史,尚属“未完成”的“年轻”的学科,但因为与对象贴得太近,加之体制的、人事的、世俗的等诸多因素,往往显得十分复杂,不易把握;同样一个作家作品,评价起来,彼此歧异也很大。我的工作,主要是想通过“三元一体”、“文献性”、“客观性”等思路和方法,对之作出属于自己的评判和阐释。

第三阶段,就是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这也是构成我近些年来治学的重心。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追溯起来,最早当推与赵卫东合撰的《应当重视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sup>①</sup>一文,首次对当代文学史料内容、特点及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作了初步梳理。当然,这是很粗糙也是很初步的。真正的研究开始并进入一种状态,应该是2010年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被批准立项以后。在此期间,对当代文学史料所作的“整体系统”研究(而不是“专题”探讨),其阶段性成果,刊发于《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并于201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编出版了一部65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论著;同时,还在浙江大学出版社主编出版了两套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与陈建新合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共11卷,现已出5卷),将文学史料的有关理念延展到了选本编纂和文学教学上来。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的“阿基米德点”。然而,当代文学却在这方面存在着历史性的欠缺,长期以来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学评论”或“以论代史”的路数,这对该学科的发展尤其是长远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对此作带有补课性质的“战略”调整。

也许与上述经历有关吧,它不知不觉地培养了我的文史互渗的学术趣味和治学方向。不仅是文学史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就是历史小说研究和当代作家作品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较多的史学元素,而不是也不愿将思维

<sup>①</sup> 吴秀明、赵卫东:《应当重视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停留在狭义的纯诗学的即纯审美的范畴。在这里，“历史”成了我治学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和切入点，一个互动互证对话的重要内容和方法。胡适曾云：“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入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他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研究，很重要的，就是在方法上要有“历史的眼光”。<sup>①</sup>对此，我深表赞赏。当然，它也由之对研究者的史学素养提出了要求。而这，对于像我这样没有受过史学专业训练的当代文学学人来说，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也是很有难度的——应该说，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整个中文一级学科，除古典文献学外，我们都没有至少没有受过专门的史学训练（含史料研治），而往往将中文系的“文学教学”变成了与历史无关的单一的纯诗学教学。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理论和批评不重要，意味着要返回到曾经有过的“为史料而史料”的老路，像当年乾嘉学派的某些末流那样，死板地抱持传统史料工作的那个“说五字之义至于二三万言”的烦琐作法不放，将史料与理论、批评绝对对立起来。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当下学界对其理解是有歧义的。为了表示自己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与整体性的当代文学研究的追慕，我曾将当代文学学者知识结构及其研究比喻为是由“史料实证”、“作品解读”与“理论思维”三者构成的一个富有意味的“正三角”（“△”）：如果说处在“正三角”尖顶的是“理论思维”，对“作品解读”与“史料实证”产生能动作用，那么居于其底线两个端点的“作品解读”与“史料实证”就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理论思维”，使之成为实事求是的言说。<sup>②</sup>韦勒克和沃伦为了更有效地对文学作系统整体的研究，六十多年前，在他们那本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中，就提出过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者相互区别又相互包容的观点。他们认为以上三者的研究方式不能单独进行：“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①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载《东方杂志》，收入蒋大椿：《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

② 具体阐述，详见本书上编《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一文。

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sup>①</sup>他们的话，值得深思。

当代文学的历史已近七十年，从时间的长度、作品的数量、思潮的频率来说，都远超于现代文学三十年，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以前的那种陈旧的习见的观念之中，将其一股脑儿地都看作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学。在理论、批评与史料均有颇多成果和积累的情况下，将它们彼此融会贯通，更有利于形成一种整体综合的学术优势，也更能充分反映和体现当代学科的学术风貌。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研究当然要从传统那里寻求借鉴。在这方面，我们以前忽略了，甚至出现了不应有的中断，今后需要大大强化；但同时不能将其简单化、绝对化，毕竟当代不同于古代及现代，今天有今天的情况和问题。而且，作为人文学中最具个性、灵性和弹性的文学研究，对于美的敏锐感悟和评判，同样也是学者的一个重要的素养和能力。这可能与自己从事过文学批评的经历（主要是历史小说批评）有关，但这一切都应该置于整体性的思维理念和阐释体系中加以考察，并且要“历史化”。

十多年前，在回顾和总结自己学术道路一文中，我曾斗胆提出了“建立根据地”与“超越根据地”的主张。所谓的“建立根据地”，是指在茫茫的学海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家园，并用自己的实践加以确立；而所谓的“超越根据地”，则是指在找到了自己的学术位置以后，又不满足，对原有定位有所突破和超越。我认为理想的学术研究，都应该有自己的“根据地”，否则，跟着感觉和时尚走（现在是跟着体制化的研究项目走），四面出击、到处布点，也许很热闹，但终因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导致话语权的丧失。但“根据地”的建立，也有可能使你陡生一种自恋性和封闭性的思维惰性，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所以，它也是有陷阱的，有必要从自己经营成熟的“根据地”进行突围。这一步如果跨出去了，而且跨得好，它就可为自己后来的研究孕育和催生一个新的飞跃，这有利于学术的提升和发展。大量事实也表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学者，他是不愿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恒定的格式和秩序之中的，而总是使自己的研究处于一种

---

①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动态的开放状态。如此,才能有更大的成就和作为。

在“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当然有起码的自知之明,但就主观意愿而言,应该说,我对此还是比较注意的,至少有一定的自觉意识。不妨自夸一下,如果说历史小说研究是我建立的一个“根据地”的话,那么后来的文学史和文献史料研究,就是我对原先建立的“根据地”的“超越”和再“超越”。正是在这样的“建立”而又“超越”和“再超越”的过程中,我感到了学术探索的一种乐趣,一种富有趣味的弹性和张力,同时也给自己的研究平添了某种爬坡的难度。学术研究是因人而异的复杂的精神劳动,不可强求一律。但倘作深究,这里的确有个“根据地”即定位以及如何辩证地看待定位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普遍规律吧。我想,理性的、睿智的态度应该是将其纳入动态的阐释体系中进行观照和把握,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恒定的、僵硬的学术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根据地”既是一种固守,也是一种探索,又是一种丰富,它是与“原点”的一种不断的互动和对话,是可以而且应该纳入历史脉络和进程中进行考察的。

当代文学是一体化的文学,也是朝代史或国史的文学,还是现代新型的文学。它看似没有门槛,没有任何的阅读障碍,但真正研究起来实则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任何的夸大和无视,轻言和急躁,都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必要的。一代有一代的机遇,一代也有一代的学问。相比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对典籍熟悉程度和传统文化涵养方面也许自叹不如,但在新理论掌握和新方法使用方面,却自有优势和特长。因此,在中文一级学科的大家族中,我们当然应该甘当“小弟弟”,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更不能因为对过度理论化、批评化的反思,就剑走偏锋地将自己推向“反理论”、“反批评”(或“去理论”、“去批评”)的窄路上。

回到研究的话题上来,眼下的当务之急,我以为是在接续传统或成熟学科的学术传统,同时又充分利用现代或新的理论、批评和文献条件,将理论、批评与史料三者之间打通,逐步向学科化、专业化转换,甚至不妨将其当作一门“学问”去作,就像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一样。这也许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近些年来兴起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历史化”的根本要义之所在。

# 目 录

## 上编 文献史料的研究与阐释

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 .....	003
当代文学史料存在方式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	027
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 .....	037
“一体化”视域下的当代文学运动史料 .....	054
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 .....	073
当代文学版本生产与版本批评的实践 .....	096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时空拓展及其档案制度障碍 .....	123
“文化中国”视域下的世界华文文学史料 .....	142
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如何“及物”	
——基于“文献”与“文本”的一种解读 .....	160
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	
——基于文学史料的一种考察 .....	179
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与方式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的编纂理念与学术追求 .....	201

## 中编 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

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	
——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 .....	211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  
——吴秀明自选集

当代文学独特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	
——兼谈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 .....	222
整体性文学史编写的两个纠结点	
——关于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	234
当代文学史编写三个问题及相关选本的编选 .....	246
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位置与现实境遇	
——兼谈主流体制下中介系统及其角色功能的嬗变 .....	262
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	
——兼谈整体研究的几点思考 .....	273
文化转型与当代中国文学的“三元”构成 .....	287
海外汉学对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以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为例 .....	300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	
——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 .....	316
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谱系考察与视阈拓展 .....	335
漫谈大学中文学科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	351
面对“丘陵”的忧思	
——关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几点思考 .....	357

**下编 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 .....	369
论 90 年代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 .....	383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历史小说及其发展 .....	395
当代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事 .....	400
历史追忆中的多层次掘进	
——论近年国内“反法西斯主题”的抗战文学创作 .....	416
论世纪之交的领袖传记文学创作 .....	430
“故事新编”模式历史小说在当下的复活与发展 .....	446

从历史真实到现代消费的两度创造 ——论历史文学真实的现代转换 .....	459
论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历史翻案”现象 ——兼谈当前历史学的历史观和艺术创造力问题 .....	473
论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影射”问题 .....	487
论历史文学创作中的“现代化”问题 .....	498
论茅盾对现当代历史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	512
后 记 .....	532

上编  
文献史料的研究与阐释



## 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 及其基本形构

中国当代文学迄今为止已有 60 余载,是“现代文学”的两倍时长,就学科来讲不算“太年轻”了。但由于诸多原因,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仍处在“很大的不稳定性”状态,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裂”,甚至连基本的价值衡估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是不多见的,包括与它密切关联的“现代文学”学科。<sup>①</sup>

针对上述这种状况,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先认识后评价”的主张,认为当务之急是当代文学研究界要转变意识,“起码有部分学者从‘前沿’状态抽身退却,不参与各种时论争辩,专心作当代文学史的案头工作”。<sup>②</sup>也有学者从学科“历史化”的角度,提出“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问题,认为当代文学要想成为一个像“现代文学”那样“相对成熟和高水平的学科”,就应“按照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式,对之进行长时期的资料收集和积累”,走“古典文学化”的研究路径<sup>③</sup>;而在当下,尤有必要在研究思路、格局、向

① 当代文学的价值衡估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充满歧义的话题,从 2006 年德国顾彬提出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以后,学界就“如何看待当代文学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期间不少学者也介入此讨论。这种情况,正如洪子诚在比较“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研究差异时指出:“对于现代文学史,经过 50 年代,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在几代学人的勤奋工作中,已处在一种相对的稳定之中。而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则可以说还是暴露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之中”,“可以看到,在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视角、立场、方法上比较一致的情况下,已在发生变化,出现了‘分裂’”。见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

② 李洁非:《典型文案》写在前面,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③ 程光纬:《主持人语》,转引自蒋晖:《试论赵树理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主题和形式》,《文艺争鸣》2012 年第 12 期。

度和方法上进行一次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重要调整，即从原来比较单一的“阐释”走向“阐释”与“实证”兼具<sup>①</sup>，等等。现代文学在草创时期即具有较强的史料意识，便注意史料的搜集和保存，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如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尤其是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的出版），当代文学相形之下就显得滞后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才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命题提出。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不也正表明当代文学学科已逐步进入对自我的根源性反思的阶段，它开始由不自觉走向自觉。

本文试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探究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追问它在当下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学理依据，梳理其自身探索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形构和主要类型特点，辨析它与思想阐释及研究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呈现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应有地位、作用和价值，以便更好地推进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进程。

## 一、问题的提出

首先，有必要对文学史料概念作一番界定，以使问题的探讨有个明晰的疆域。所谓文学史料，即指研究和编纂文学时所用的资料，就大的而言，主要包括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现当代文学史料概念更宽泛，还进而将注释学、文体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等都涵盖进来，可以说是兼及古今、融会传统与现代的一种“全集息”的综合。文学史料源自历史，带有很强的客观性，但作为以往知识与信息的记录，它又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甚至夹杂着虚假的信息。因此，文学史料有个考订辨伪的问题，史料进入研究视野，必须经得起历史与理性的叩问与筛选，不是所有能见到的史料都可作为探讨规律之用，也不是所有史料都具有同等价值。以往，“人们通常把史料看作是‘死’东西，把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看作是一个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一个天大的

---

<sup>①</sup> 吴秀明：《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

误解。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sup>①</sup>因此,文学史料尽管在表现形态和方式上有古今之别,但就其本质来看,它都是人类生命一种折射,都无不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内容。那种将文学史料看成是传统学科的“专利”,看成是消极的单向的工作,不仅是片面的甚至是浅薄的,它只会给文学研究带来伤害。

当然,这是今天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它已被人们照单接受。恰恰相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不被重视的,甚至在当下项目生存化、学术浮躁化、功利化的学术环境下,将其视为没有学问的“小儿科”乃至不算学术成果,不愿从事这项艰苦寂寞的工作,也不乏其人。克罗齐曾指出,“一个人重新整理一部书的可靠文本,解释已被遗忘的文字和风俗,研究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情况,完成一切工作,使艺术作品的品质与本来色调复活,他是不应受到鄙视与嘲笑的”。<sup>②</sup>遗憾的是,这种“鄙视与嘲笑”在我们这里一直未曾中断。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像徐庆全、黎之、刘锡诚、陈徒手、李辉、傅光明、洪子诚、李洁非、刘福春、程光炜、陈思和、於可训、金宏宇、谢泳等都曾在这方面作过专门探索,并给我们留下了一批成果,特别是孔范今、雷达、吴义勤和施战军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张健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等,可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也为当下和未来史料整理与研究打下了基础。另外,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出于盛世修史的需要,也普遍加大了对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各种各类史料的重视和投入。就拿2010—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来说,被批准立项资助的就有“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当代文学史资料长编”等14项,

① 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②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173页。

有的还列为重点项目。<sup>①</sup>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二批基础类)118项,其中史料整理与研究就有58项,立项率占该批项目总数近半。有意思的是,像《文学评论》这样评论或理论类的权威刊物,在2012年第6期竟打破“常规”,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以引征史料为主(史料引征占全文五分之四以上)的洪子诚长文《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但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一切对当代文学史料来说仅仅是开了个头,带有“启动”性质,实际上在成就的背后存在着不少问题,离人们的期待和学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也许与“贵古贱今”观念有关,长期以来,中国文史学界如胡适批评的“仍然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sup>②</sup>,往往只注意古代史料的辑佚、整理与研究,而漠视当代史料。以致到了后来,情况愈演愈烈,“乾嘉以后,上流人才集精力于考古,以现代事迹实为不足研究。此种学风及其心理,遗传及于后辈,专喜寻扯残编,不思创垂今录”。<sup>③</sup> 甚至将其排斥于研究的视野之外,造成了研究的封闭和僵硬,这种情形至今仍有相当的市场。君不见不少文献史料学或文献史料丛书将下限锁定至“晚清”(最多下移至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范畴),并被视作是一条隐性的“规则”或“规范”吗?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梁启超,他在20世纪初崇古之风甚烈的情况下,仍密切关注当代史料,还以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史料无人及时整理为忧作深刻的自我反思,对乾嘉学派学风提出了批评:“我自己便是遗传中毒的一个人,我于现代事实所知者不为

① 2010—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含重大招标项目)有:“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吴秀明)、“当代文学史资料长编”(程光炜)、“抗美援朝文学叙事研究及史料整理”(常彬)、“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黄发有)、“穆旦诗编年汇校”(易彬)、“网络文学文献数据库建设”(欧阳友权)、“中国当代杂文编年史”(王岩森)、“袁牧之整理研究暨《袁牧之全集》编辑整理研究”(杨新宇)、“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研究暨史料整理”(颜敏)、“1949—2000年英语世界中国‘十七年文学’传播与接受编年史”(纪海龙)、“《格萨尔》各类版本综合研究”(仁青道吉)、“西藏当代文学编年史”(1980—2010)(东主才让)、“新疆当代江格尔奇的田野调查及其档案库建设研究”(吴铁木尔巴图)、“蒙古族科尔沁叙事民歌田野调查与传承研究”。其中“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网络文学文献数据库建设”为重点项目。

② 《胡适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

少,何故总不肯记载以诒后人?吾常以此自责而终不能夺其考古之兴味,故知学风之先天的支配,甚可畏也。呜呼!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sup>①</sup>他对当代史料价值的认识,以及在这方面的忧思,令人感动,已经化为我们不少同行的广泛共识。尤其是现在知识与材料愈是海量,借助于云计算、云储存技术,愈是容易获取,这对区分、筛选与处理能力提出挑战。其实,就这些数量庞大的当代文学史料而言,当代文学史料搜研面临压力是空前的。正如鲁迅所说,“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sup>②</sup>从史料实际情况来看,似乎是时间愈远愈清楚,愈近反而愈糊涂、叙述起来愈难。现当代文学是“目的引导型”的一种文学,它不同于“自然生长型”的古代文学,是从生活的土壤中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而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到今天名目繁多的各种文学,都是在理论的“导引”下,往往先有理论后有创作,更多借助于外在的强力推促的结果。<sup>③</sup>因此,其史料不仅庞杂而且呈弥散之状,与社会政治粘连特别紧密。这自然不能不加剧了史料整理与研究的难度。

当然,在这里之所以将当代文学史料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主要还是基于当代文学研究在现有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发展的全局性考虑,包括文学史编写,也包括学科建设。大家知道,学术研究的推进主要取决于新史料的发掘和新观念的提出,这也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而当代文学,由于学术研究时间比较短、积累有限,特别是由于外部学术环境的影响,长期以来盛行的却是“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的研究理路,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内驱力和进行学术评价的依据,主要是思想观念而不是文献史料,后者甚至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这样一种研究理路在学科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无可非议,特别是在新时期之初整体文化思想处于十分封闭僵硬的情形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深刻的合理性,且的确也发挥了作为新的“思想模式”或“理论模型”的重要的“生产能力”作用。<sup>④</sup>但不必讳言,这种研究本身是存在问题的。第一,它用作武器的“理论模型”因来自异域,有些也许适应西方而不一定适应中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0页。

③ 参见张志忠:《序言:严谨而生动的学术灵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④ 参见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

国。第二,更为主要的是,它忽略了范式赖以存在发展的历史背景、条件与相关的知识谱系,不仅空洞轻飘而且容易走偏误读,影响了学术价值,而且催生了焦虑、浮躁与粗疏的学风。

当代文学毕竟走过60多年历程,已有相当的史料积累,现在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了。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嬗变和档案的开放,陆续不断有新史料的发现或披露,如白洋淀诗歌、“文革”地下文学、“五七”干校文学、校园文学、旧体诗文,以及大量的书信和日记等私人性质史料,包括影响很大乃至堪称经典的《刘志丹》、《草原英雄小姊妹》、《二泉映月》的内幕史料,也包括蒋介石日记、红卫兵小报等诸多新史料或域外史料,等等。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文本不同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文本,因作家本人健在,也因政治因素的介入,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有一个不断修改的问题,有的甚至刚刚发表,马上就进行修改,它是处于一种未完成的、不确定的状态。如《青春之歌》、《山乡巨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红色经典”的修改,《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等“样板戏”的修改,“茅盾文学奖”以“修订本”的名义获奖的两部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白鹿原》的修改等。所有这些,都应及时反映并纳入研究视野或文学史编写之中,相应的文学史书写或原有的研究,也要因这些史料的挖掘而出现或大或小的变动与调整。对此,近些年来虽陆续有所反映,但相比于实践还是很不够的。而这,恰恰是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要特色,是构成其“当代性”及其特殊存在的一个具体表现。

特别需要指出,当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一个很大差异,就是除了“死”材料之外,还有存留在不少当事人脑海或口头的“活”材料。相较于那些已形成文字或图片并被收录进档案的“死”材料,“活”材料因没有固化,且受当事人主体条件尤其是不可抗拒自然规律的限制,加上其他各种因素,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随时可能湮没的紧迫状态。有位哲人就曾沉痛地感叹,“每一个老人的死去,就像是一座图书馆的遭到焚毁”,这对史料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王乃庄在《舒乙与〈老舍〉》一文中讲到曾三次去访问老舍亲戚和同学,而他们都幸在近期去世,甚至将老舍遗下的一部日记当作“无用的废纸”烧掉的经历,就非常典型。<sup>①</sup>如今,不要说老舍等老一辈作家早已作古,就是比他晚几十年

<sup>①</sup> 参见王乃庄:《舒乙与〈老舍〉》,《北京日报》1986年9月19日。